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

小林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

小林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7

本书在材料搜集和写作上，曾得到原反战同盟华北
联合会会长松本一夫（前田光繁）的支持和帮助；在文字上，
杨式庚同志帮助作了整理。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林清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

小林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建外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字数110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1419·002 定价：1.40元

前　　言

今年是“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我们出版这本《史话》，奉献给广大读者和历史研究者，以纪念伟大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五十周年。

作者小林清，根据亲身的经历，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历史，描绘了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对日本帝国主义反戈一击的感人的战斗事迹。

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反对的，日本军阀在中国土地上灭绝人性的暴行所写下的血腥历史，是永远涂抹不掉的。相反，日本士兵和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是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深刻表现，是中日关系史上美好的一页。这本《史话》，也是学习和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份最好教材。

关于作者的情况，我们特转载《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的两篇访问记，作为附录，供读者参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年7月7日

目 录

第一章 反战组织的建立和反战运动的开展	
(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二年六月)	
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	(1)
二、觉醒联盟各支部	(9)
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重庆本部	(19)
四、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华中各支部	(23)
五、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51)
第二章 反战组织的统一和反战运动的活跃	
(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一月)	
一、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65)
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	
反战团体大会	(69)
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成立	(77)
四、《日本士兵要求书》	(80)
五、他们在这样斗争着	(99)
第三章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和反战运动的胜利结束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九四六年)	
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召开	
扩大执委会	(109)
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	(121)
三、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日本同志	(127)
四、日本投降及日人解放联盟出发纪念大会	(132)
五、回归祖国——日本	(139)
结束语	(142)
附 录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大事年表	(145)
富士泰山映寰中	刘晓原 卢盈卿 (149)
他爱日本，也爱中国	张惠才 (152)

第一章 反战组织的建立和反战运动的开展（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二年六月）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那就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它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下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的影响和教育下，许多被俘的日本士兵和下级军官，通过学习和教育，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不仅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明白了为了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下解放出来，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不可。

一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六项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唯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六项命令提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

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又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规定“对俘虏禁止杀害，不准没收财物。禁止任何侮辱人格、习惯，负伤的绝对禁止补枪。阵亡的敌军官兵尽可能掩埋立碑，不愿随队行走的，就地释放。”在这个指示及毛泽东同志的几篇著作中都强调了对日俘不加侮辱，尊重人格问题，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俘虏政策的发展，也体现了民族斗争的特点。

日本民族由于受历史传统所形成的狂妄的民族自尊心和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所以象日军士兵骄傲蛮横，刚愎不逊，爱面子，被俘时不愿受人凌辱等等现象，这种表现出来的自尊心，在世界上各国军队中都是很突出的。因此，能不能尊重其人格，就关系到能不能发挥党的俘虏政策的巨大威力、争取日军士兵觉悟的重要问题。

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令》指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教育、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

六月七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指出，俘获敌军士兵后，即给以好的招待与宣传。凡愿意回去者，经过短时的宣传与谈话，使他们知道日本关于八路

军的宣传是欺骗他们的，然后一律放他们回去；凡不愿回去者，禁止强迫送回；对新俘虏之工作，可利用旧俘虏去进行，并提出训练俘虏的注意事项。在这两个文件中，都强调了争取俘虏为我军服务的问题，这是党的俘虏政策的又一重大发展和完善。它对于尽一切可能，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孤立和瓦解敌军，削弱敌军战斗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名义发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命令》指出：“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的予以方便”。“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

同日，又发出《关于建立日本士兵墓标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中，提到关于阵亡的敌军官兵掩埋立碑的问题，在这两个文件中又作了更具体更详细的规定。这是抗日时期党的俘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特点。

日本是个封建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其军队亦相当浓厚地反映着落后的封建意识。如日军官兵之迷信天皇，崇拜偶象，一般都拜佛念咒，身怀护身符。在战场上全力夺回其伤员，将尸体付诸火葬。即使在紧急场合，亦必割死者尸体的一耳一臂带回火葬。这种中世纪的封建迷信，为日本统治阶级与法西斯军阀所利用来发动战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针对日军这种封建迷信意识，通过对死者的处理而发生作用于生者，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科学性。

战胜敌人，一要靠强有力的武力打击，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二要靠有效的瓦解敌军的工作。削弱，摧毁其战斗力和战斗意志。

特别是在中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对手——日本帝国主义是

强大的。它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它有较中国军队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也不仅仅在于它的兵员有比较良好的军事教育，更主要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它通过各种学校，通俗刊物，书报杂志等，拼命地进行“无私奉公”、“宁死不屈”、“至死不降”的武士道精神的教育，要人民效忠天皇，贡献生命给天皇。他们利用各种变相的军事辅助训练，进行这种宣传。特别是在军队中，更着重于所谓“精神教育”，如经常举行的向天皇的相片敬礼，遥拜日本东京皇城，奉读天皇诏书等精神训话各种仪式，使日本人民的精神禁锢在军国主义的枷锁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各种欺骗宣传，用来麻醉日本人民的精神。他们把侵华战争解释为实行所谓的为防止赤化，为建立王道乐土，为东亚永久和平，为中日共存共荣而进行圣战等。日本士兵把这种欺骗宣传当作一种信仰、理想和目标来追求，成为他们作战的主要精神支柱。

还有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拼命鼓吹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利用日本民族一度的顺利发展和数次战争的胜利，把日本大和民族标榜为优秀的“天之骄子”“独得天佑”，宣扬“皇军战无不胜”，造成日本士兵极其骄傲的自尊自负的心理。

另外，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狭隘的排外主义与民族隔阂，利用中国社会的许多弱点，把中华民族描绘成非常下贱的野蛮劣等民族，造成日军士兵对中国的轻蔑观念。并以放纵日军的暴行，制造和加深民族偏见和仇恨，以防止日军士兵对中国的了解和接近。而这种民族偏见与隔阂，在不自觉的条件下，有时比阶级仇恨表现的更为深刻和尖锐。

敌我双方，在政治上的接近，往往总是由感情上的接近开始，有了感情上的某种程度的融洽和谅解，就为政治上接近奠定了基础。

党的俘虏政策，对俘虏伤者医治，死者掩埋立碑，生者不杀

不辱，尊重人格，不打不骂，不搜财物，不干涉信仰，不要求自首，生活上优待，这就与日军的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事实粉碎了日军的欺骗宣传，动摇或改变日军士兵因被欺骗而形成的各种错误观念，解除其害怕当俘虏的后顾之忧，起到削弱日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的作用。

如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军在大龙华战斗中俘获日军栗屋大队士兵十四人，经短期宣传教育后释放。日军却以残酷手段对待这些释放了的俘虏，引起日本士兵的普遍不满，加深了官兵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这十四个人的释放及其在八路军中受到的优待，在全大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七月，八路军又与日军栗屋大队交战，该大队日军大部分不战而溃散。有许多自动举手缴械，并表示感谢八路军释放俘虏的美德。（《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第九期）

又如，一九四二年，八路军在清丰西碾头战斗中俘日军士兵二名，经宣传教育后释放。不久，这两个士兵随日军出来扫荡，遇八路军侦察员，不但不打，反而点头打招呼。（《八路军军政杂志》第四卷第三期）

党的俘虏政策用事实否定了日军的欺骗宣传，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瓦解日军创造了条件。日军广大士兵可能因此改变和动摇以往对我军的看法，因而带着疑问的目光观察八路军，有目的、有意识地了解八路军，接触八路军，接受八路军的政治宣传。

中日交战初期，八路军的政治宣传很难为日军所接受。随着党的统一战线和俘虏政策影响的扩大，日军士兵对八路军的宣传品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常常把八路军的宣传品宝贝似的收藏起来，背着长官偷偷阅读，有的甚至张贴出来集体阅读。一九四三年三月，路安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一个下士官，看了八路军的传单后，还向老百姓索要，他说：“你的八路的我的朋友大大的有，这个多多的有没有？”（《日本战友在这样斗争着》）

日军第三十师团炮联队的一个士兵，在行军休息时看八路

军宣传品，许多士兵都围拢来，争着抢着看，直把小册子扯成两半，拿了撕烂的小册子，还看了几遍。（《日本战友在这样斗争着》）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优待俘虏，更重要的是从情感上感化俘虏，消除敌对情绪。日军士兵往往把生命与人格看的同等重要，甚至被俘后宁愿速死，也不愿在人格上受侮辱。因此，在政治上，生活上优待，消除敌对情绪，往往是其思想转化的起点。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中，各种物资极端困难，但对于日本士兵的供给仍大大优于八路军一般士兵。同时在政治上，不仅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信仰，把他们当作阶级弟兄对待，而且给了他们学习，娱乐等各种自由，甚至还给那些觉醒的日军士兵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森健，曾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这种优待从感情上溶化了日本士兵的敌对情绪。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士兵曾感动的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日本士兵大会、反战固体大会《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把我们当作朋友、弟兄和同志看待。”（日本工农学校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学典礼上《学员誓词》）“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日本士兵大会，反战团体大会《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

在消除敌对情绪的基础上，释放俘虏回来，可通过俘虏宣传党的俘虏政策，沟通与日军士兵的关系，疏通情感。俘虏归回的本身不仅是对党的俘虏政策的一个宣传，而且一般的俘虏在八路军优待和教育下，总会有某种程度的转变。他们回去，总能消除一些成见和误解，成为疏通民族感情的媒介和瓦解敌军的义务宣传员。事实上释放回去的俘虏，有不少是感激涕零。甚至替八路军宣传，愿意与八路军继续发生关系，为八路军工作。

如在冀南，八路军俘日军少尉冈田，经宣传教育后释放。他对八路军的优待十分感动，临走时，流着泪，握着八路军战士的手说：“死也忘不了你们的恩惠。”骑上马后，还依依不舍地几次回头凝望为他送行的八路军战士。他回到原警备地区后，马上召集部下士兵，诉说他在八路军中所见所闻。并发训令道：“八路军和反战同盟决不是土匪，而是通达人情，懂得仁义的优秀部队。我们以后俘虏八路军的士兵，决不该杀他们或者侮辱他们，要好好的优待。”（《日本战友在这样斗争着》）

还有日军驻山东沂水竹林部队的某伍长，就从中野队长被八路军俘虏后又释放回来的事实中，了解到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因而乘日军出动扫荡的机会，毅然携械投诚八路军。（《八路军军政杂志》第四卷第三期）

甚至日军的尸体，也能起到宣传与沟通民族隔阂的作用。在冀鲁豫军区，八路军将日军二名死者和一名重伤者送回日军后，该中队吉本中队长十分感谢，写信道：“来函及三名部下，小官确已收到，无误。不胜感激之至。小官对阁下及诸君之情谊，衷心感谢……谢谢！谢谢！草草不恭，以后再见。”

不久，他又写信道：“……谢谢你们日前盛意。阁下及反战同盟有什么困难没有，假使有的话，请不客气直说。只要在小官可能的范围内，无不照办。”（《日本战友在这样斗争着》）

还有的日军士兵送军事情报给八路军和反战同盟。在天津附近的日军一个碉堡内，有个名叫中村的上等兵，曾写信给反战同盟：“今天，有一桩紧急事情告诉你们，上面有命令，两三天内，在这一带要进行扫荡。因此，你们见信后，请马上转移。我以此来报答你们的厚意。火速，火速。”

收到信的第二天，反战同盟和八路军的一个支队离开那里，转移到其他地方。日军果然向那里进行猛烈的袭击。可是，那个地区已无人影。（《日本战友这样斗争着》）

感情上的接近，就为政治上的接近开拓了道路。在这个基础

上，对俘虏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其阶级觉悟，使其认识到自身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

抗日战争时期对日俘的宣传教育，除对一般的日俘进行短期的宣传教育后释放外，对留在八路军中的日俘，送专门机关进行培训教育。在延安，晋西北，山东，华中还设立了专门培训日本士兵的日本工农学校。

通过在日本工农学校的学习，使他们懂得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清了帝国主义对内实行阶级压迫、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瓜分世界的本质，懂得了自身受压迫的根源，看清了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罪恶目的。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随着党的俘虏政策在日军士兵中的深入和瓦解日军工作的加强，日军中反战、厌战情绪日盛，逃亡、自杀、投诚事件日益增多。在八路军中的日本人，一九四〇年自动投诚者占百分之七，一九四二年占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四三年占百分之四十八。（《反战兵士物语》）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在日军中产生的效果，使日军极度恐惧，他们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九期）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的影响下，来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日本士兵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先后自动地组织了各种反战组织，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觉醒联盟各支部

（一）觉醒联盟晋东南本部

在八路军中的日本士兵，通过教育和学习，明白了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不仅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明白了要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前进不可。他们毅然决然地站到反侵略战争的行列中，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一九三九年正月，八路军总司令部和野战总政治部在山西省东南部召开祝贺新年的集会，原日军士兵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三个日本人在会上表示志愿参加八路军，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烈欢迎，并批准他们加入八路军。

他们成为八路军之后，并不是拿起枪和日本军队战斗，而是积极地向日军开展政治攻势，揭露侵略战争的本质，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等政策。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极力制造狭隘的排外主义与民族隔膜，利用民族间语言不通等因素，对八路军进行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歪曲宣传，污蔑八路军是“穷凶极恶，残狠无比的野蛮人”、“支那人太野蛮，对于被俘的日本官兵即一刀两段，如此永世不能投人胎了。”因而“在火线上即使被打死也不能缴枪”等等，以造成日军对被俘的恐惧心理，以至在战场上宁愿战死，不愿缴枪。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抗战初期，日军似乎是坚不可摧的，他们往往已处于完全失败、溃散的局面，但仍坚不缴枪。甚至有一个日军俘虏，当八路军医生替他换药时，竟乘医生不备，用小刀伤害医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回答“你们太野蛮，你们医好我之后还要割去我的头，使我不能再转人世！”有的日本士兵认为作了“乞丐军队——八路军的俘虏，是天皇臣民不能忍受的羞耻，再没有脸回故乡见父母兄弟了”。所以被俘后

还十分傲气，只求速死，以示对八路军的轻蔑。或者企图逃跑，捣乱破坏，甚至自暴自弃，敌对情绪相当严重。

日本士兵这种由于被欺骗，被蒙蔽而造成的思想意识的中毒症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长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自然给八路军在军事上战胜敌人、政治上瓦解敌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因素。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摧毁日军借以支持战斗意志的精神支柱。精神支柱一旦垮了，敌军便会不战自溃。这就必须从消除日军士兵对于中华民族盲目的对立情绪入手。而且由原来的日军士兵去做这种宣传工作，就会起到连八路军都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一九三九年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日本军队的进攻节奏放慢。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在八路军中觉醒的日本士兵加强了对日军的宣传。当他们得知日本青年进步作家鹿地亘和妻子池田幸子，化装成演员从上海通过秘密途径到达重庆，正在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非常高兴，觉得有必要联合起来搞反战运动。于是通过八路军的帮助给重庆的鹿地亘去了数次电报和信件，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始终没有联系成功。

因为国民党政府对鹿地亘的建议和活动根本不重视，认为是“过左”行动，当然不让八路军内的日本士兵和他联系。直到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以后，美国方面开始重视对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进行宣传，鹿地亘才从被动地位中解脱出来。（〔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没有和重庆的日本人联系上，于是决心自己起来组织反战团体。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八路军帮助下进行的。这时除了杉本一夫他们三人外，又增加了四个日本人。他们是福井县的后备兵高木敏雄，他是不满日本军队的行径自己跑出来，投奔八路军的，还有在战斗中被俘的松井英男、石塚修等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那天，在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成立大会。

觉醒联盟的宗旨是呼唤广大日军士兵觉醒，起来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反对作日本军阀、财阀的炮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和平与侵略中国的本质和罪恶。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革命经验，研究日本革命问题。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觉醒联盟刚成立时，全体盟员的政治水平都不高，也没有工作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帮助下，逐渐开展了对日本军队的宣传工作，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每次出去宣传时，都由八路军或地方武装派部队保护，这就保障了盟员们的安全。盟员们对此深为感动，在战场上更为积极地向日军宣传。如在关家垴战斗中，杉本一夫同志在激烈的战斗中用日语向日军士兵大声喊话。他本人对当时战斗中的宣传工作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四〇年十月下旬，八路军巧妙地将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约一千二百人）引到关家垴地区，切断了他们同其他部队的联系。关家垴是山西省东南部武乡县城以东的一个荒僻村庄。

参加这一作战的部队是一二九师的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以及原国民党军的地方部队与八路军联合的范子侠将军的平汉纵队。以罗瑞卿将军为主任的野战政治部也搬到战场的前沿。我就在这个野战政治部里工作。

两军对打持续了几天，日军逐渐地被赶到丘陵上去了。突围失败的日军用无线电请求飞机援助，数架飞机昼夜在战场上空飞来飞去，反复对我方阵地进行狂轰乱炸。

在激战中，我提议到火线上呼吁日本士兵投降。指挥机关同意了，并指示到平汉纵队去。我于二十九日下午赶往平汉纵队的

途中，出乎意料地看见了刘伯承将军、邓小平政委和政治部蔡主任。蔡主任鼓励我说：

“那可危险啊！要特别当心，祝你成功！”

投完炸弹的飞机一消失，我方的迫击炮便开始密集攻击了。这时硝烟笼罩着战场，火药味直呛鼻子。日军飞机再来时，我方就用机枪和步枪对付它。我眼看着一个排长刚一站起来就倒下了，士兵们立刻跑过去，把他从火线上抢救下来进行治疗。那是肉搏战之前的殊死战斗，根本无法上去呼吁，因此喊话只能等到那天晚上了。

夜幕降临，枪声暂时稀疏了，日军飞机也未来轰炸。在黑暗中，我方部队活跃起来，为发起最后的攻击，开始集结部队和作政治动员。

快到半夜时，部队已做好攻击的准备，于是传来命令，该我行动的时候了。攻击的八路军停止了射击，我找机会向日本士兵喊话。虽然日军受到武士道精神影响很深，但是现在这支日军已陷入一筹莫展的绝境。只要有人响应鼓动投降的喊话，就说明这种喊话符合战争的道义。我缓慢地大声喊道：

“各位日本士兵！现在八路军已停止射击了，各位也不要打了，听我讲几句。我确实是日本人，原来我是各位的战友，现在我已参加了八路军，但我的的確確是日本人。

在八路军中，有由原来的日本士兵组成的觉醒联盟。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尽可能多地拯救日本士兵的性命，我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现在各位已完全被八路军包围了。想逃已完全不可能，你们的部队有许多人已经战死，各位竭尽全力奋战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作为军人的职责。再打就只有战死一条路了，不是可以避免最坏的不幸吗？身后万事空。再打是徒劳无益的，现在立即停止战斗吧！

到八路军这里来，各位的声誉可以得到保证。生命安全也可以得到保障。故乡的父老兄弟，妻子儿女绝对不想看到你们的骨